

基本館藏

101592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一八四八年 欧洲各国的革命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31
4041



一八四八年
欧洲各国的革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6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张 $1\frac{1}{4}$ ·字数28,000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7)0.13元

统一书号11002·95

校对者：钱再思

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

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消灭了法国具有资格限制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并且导致了一八四八——五二年资产阶级的第二共和国的建立。法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矛盾的愈益尖锐化是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原因。这时的法国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就而产生了工厂工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并且被资产阶级有权势的上层分子，即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获得政权的所谓金融贵族所统治着。把银行家、交易所經紀人以及矿山企业、森林等所有主的狭隘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金融贵族的统治，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阶级的矛盾也尖锐化了；这种矛盾引起了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增长以及小资产阶级状况的急剧恶化。在反抗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压迫时，工人们表现得更加积极；他们提出了自己本阶级的充满了朦胧的社会主义意图的要求。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六年的歉收以及一八四七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对劳动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曾给予巨大的影响。尖锐的“上层危机”加速了革命爆发的到来，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在集会和宴会上以及在国会中要求改革选举制，并且出面反对反动的基佐政府。直接引起革命爆发的原因是政府禁止原定于二月二十二日在巴黎举行的反政府的宴会和游行示威。尽管自由派胆怯地投降了，并且号召市民服从政权，但是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还是在二月二十二日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在街道上和军队及警察发生了

冲突，并建筑起許多街壘。二月二十三日巷战具有了更为广大的規模。政府所召集的几营由中小資產階級分子所組成的国民近衛軍，不願意去与人民的运动作斗争，他們有时甚至轉到人民运动这方面來。二月二十三日国王路易·菲立普被迫辞去基佐的职务，但是仍不能制止斗争。二月二十三日的夜晚，巴黎各街道上已建立起了一千五百多个街壘。二月二十四日革命先鋒队的战斗遂轉为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起义中的組織力量属于秘密的共和团体中的成員。当城市据点轉移到人民手中之后，国王的一些新讓步——無論是任命毛里，或者梯亥耳，或者巴罗为政府的首腦——都無济于事了。二月二十四日路易·菲立普讓位給自己年輕的孙兒，巴黎伯爵，自己逃亡到英国去。这样一来，由于二月革命的結果，七月王朝被推翻了。在二月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得到小資產階級及部分中产階級拥护的工人階級。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中根据自己的分期法把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的历史分为几个时期。

二月革命时期（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推翻了金融貴族独占統治的二月革命，为整个資產階級夺取政权創造了条件。在路易·菲立普退位及資產階級自由派企圖在众議院中形成攝政政体的反革命計劃破产以后，临时政府便組成了。临时政府中包括資產階級共和派的領袖們——杜滂、拉馬丁、馬尼、克列米也、曼尔恩也-帕日絲等人以及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賴得律·羅蘭和佛洛孔；临时政府中同时还容納了小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貝尔。街壘中的战士們把这兩人看成是工人階級利益的捍衛者，所以要求把他們摆到政府中去。临时政府按其構成成分來說，乃是“各个不同階級間的妥協，这些階級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

朝，但他們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斗争”，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卷，第一二一頁）政府中的領導力量屬於資產階級共和派分子，而路易·勃朗和阿尔貝爾在政府中則成了資產階級欺騙工人階級的帮凶。

起初，临时政府还不得不去考虑手中尚握有武器的工人階級的要求。二月二十五日工人們得以迅速地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就在那一天，按照工人們的要求，通过了关于“劳动权”的法令。在工人要求組織“劳动与进步內閣”的示威游行的压力之下，二月二十八日成立了“政府劳动委员会”，即所謂“盧森堡委员会”。三月二日頒布了关于縮短工作日一小时（巴黎縮减为十小时，外省縮减为十一小时）的法令，三月四日頒布了关于年滿二十一岁的男子有普选权的法令。因此，二月革命乃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階級在革命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和有決定性的政治力量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大多数工人被小資產階級的那种認為通过与共和派資產階級合作的道路便能够使資本主义社会和平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幻想所俘获。因此，無产階級認為二月革命就是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压迫，并且把它們从資產階級那里爭取到的讓步和諾言看成是社会的社会性改造的开始，而不懂得在迫使临时政府宣布共和制以后，它們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作斗争的基础，而并不是这种解放本身”。（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斗争”，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卷，第一一七頁）

二月革命以后，在巴黎和各省出現了很多的民主報紙、人民团体和俱乐部。但是这些大部分都被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和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所領導的俱乐部和報紙，都宣傳無产阶

級和資產階級利益的一致。只有個別的革命共產黨人的組織是例外，他們警告勞動人民拋棄關於所謂實行“社會共和國”的空想。但是，就是這些以布朗基所領導的“中央共和社”為核心的組織，也不能制定廣大工人群眾鬥爭的現實綱領。所有這一切都便於那些企圖在國內鞏固自己政權的資產階級能夠迅速地準備條件，以便轉入向工人階級的反攻。政府把巴黎市民中喪失了階級立場的分子組織成武裝部隊，即所謂“別動衛軍”。在救濟失業者的幌子下，組成的國家工場賦予半軍事的性質，其目的是要把工場中作工的工人變成資產階級的護衛軍。小資產階級被加上了新稅的重担，而實行新稅的必要性被惡意地解釋為仿佛是由于工人階級的“浪費”而引起的開支的緣故。在這種唆使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反對無產階級中起相當大作用的是三月十六日實施的附加“四十五生丁稅”，這使農民的狀況急劇的惡化。

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不滿情緒，估計到外省政治上的落后，千方百計地催促政府進行立憲議會的選舉。圍繞着立憲議會召開日期的鬥爭，在政府和巴黎革命民主主義者中展開開來。後者主張延遲選舉日期，以便有足夠的時間在國內進行政治教育。鬥爭的結果導致了三月十七日巴黎人民的示威遊行，從而撕去了政府讓步的幌子：選舉只從四月九日延期到四月二十三日。四月十六日發生了新的人民示威遊行（示威群眾的請願書中表示對政府在社会改造方面毫無作為表示不滿）。但是遊行以革命後工人第一次公開失敗而結束：政府捏造了關於“共產黨陰謀”的謠言，使得許多營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國民近衛軍驚慌起來。示威遊行被破壞了。這就標誌着無產階級在解決國家事務中直接影響的結束。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立憲議會的選舉給工人階級帶來了失敗，而使資產階級共和派獲得了勝利，議會中保皇黨和教權派分子取得了很大

的多数。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立宪議會开始工作。

共和国創立时期和立宪国民議會时期（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决定着这个时期的，即决定了共和国的性質和命运的是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五月十五日巴黎举行了人民的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对波蘭人民的解放斗争給予帮助，抗議立宪議会的与無产階級为敌的政策。但是这次企圖解散議会的游行，以革命領袖——布朗基、巴尔貝斯、拉斯帕尔等人的失敗和被捕而宣告結束。資產階級共和派急于利用五月十五日的事变，以便取消向工人階級所作的一切讓步。特別是六月二十二日解散国家工場，推动了巴黎無产階級的起义。受保皇派和教权派慫恿的立宪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多数的挑撥性的政策所激怒起来的起义遭到了失敗。这个失敗是由于战斗中的無产階級的孤立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动摇和农民的敌視所决定的。工人階級在这个“無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第一次偉大的內战”中（列寧語）的失敗，是一八四八年法国整个革命史上的轉变关头。在鎮压了六月起义以后，資產階級共和派向保皇党作了一系列的重大讓步。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四日立宪議會所制定并通过的第二共和国宪法具有許多反动的特点，特別是它規定了共和国总統享有强大的行政权，因此共和国总統差不多被賦予了国王的权利。对保皇党的讓步加速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失敗。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的总統选举标志着共和派資產階級候选人，巴黎工人的創子手卡芬雅克將軍的失敗和保皇党資產階級的傀儡路易·拿破侖·波拿巴的胜利。拿破侖的成功是数百万落后农民的选票所决定的。

保皇派把当时自己所反对的政党如正統派分子（波旁王朝的信徒）、奥尔良分子（奥尔良王朝的信徒）、波拿巴分子（路易·拿破侖·波拿巴的信徒）团結到統一的“秩序党”中，因此，当政

权轉移到保皇派手中时，立宪議會中的大多数便与总统及支持他的“秩序党”發生了一系列尖銳的冲突。一八四九年二月，失去自己階級支持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在人民群众面前感到恐惧并且也为人民群众所痛恨，于是接受了保皇派关于提早解散立宪議會的要求。一八四九年三月法国共和政府派遣軍隊到意大利去鎮压羅馬共和国。

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三日立法議会的选举，使資產階級共和派遭到完全的失敗，結果，資產階級共和派失去了作为国内政治领导力量的作用。同时选举表明了群众中新的革命高潮的增漲，这个高潮的特点乃在于它把与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反革命势力作斗争提到了首要地位。在無产階級的六月起义被鎮压之后，小資產階級也同样成为了資本家和反动派进攻的牺牲品，这就推动他們現在来和工人階級接近，并且导致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的产生。这个类似一七九二——九四年雅各宾党而被称为“山岳党”的联盟的领导权屬於胆怯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他們指望以合法手段取得对反动派的胜利，而不采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

制宪共和国时期和立法議會时期（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在这个期間，以立法議會（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开始工作）中占多数的“秩序党”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势力，完成了把共和国变为警察国家的事業以及为君主复辟扫清道路。“山岳党”企圖于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組織巴黎手無寸鐵的群众反对总统和立法議會大多数分子破坏宪法的計劃，以“山岳党”的完全失敗而告終。“山岳党”的失敗表明小資產階級已經喪失了領導群众向反革命势力进行革命斗争的能力。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失敗曾被“秩序党”利用来进一步取消二月革命所取得的成果。立法議會通过了旨在取消

居民的民主权利的各种法令：报刊、俱乐部、人民会议、市政厅、国民教育都受到了警察和教权派的监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民主成果——普选权的被消灭（一八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证明法国资产阶级承认不可能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的情况下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且趋向于君主制的复辟。马克思在揭露推动资产阶级放弃共和的各种原因时指出：资产阶级承受了一种“虚伪的感情”，逼使它“想要复返到那些不完全的、不发达的、因而危险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五〇页）一八五〇年——一五一年，敌对的保皇派集团——正统派分子、奥尔良分子，和波拿巴分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政局特别有利于波拿巴分子，他们的傀儡路易·拿破仑成了共和国的总统，并且拥有足以影响国家机关、军队和落后居民群众的庞大资金。波拿巴分子在军官、官吏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卖身投靠的和不坚定的分子中收罗自己的拥护者，让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相信在皇帝政权之下有发财致富的无限可能性，并在农民中加紧宣传关于“农民皇帝”路易·拿破仑的思想。

成为保皇派集团倾轧与内哄的斗争场所的立法会议已经丧失了那些渴望“秩序”并转移到波拿巴分子方面去的资产阶级的支持。这就便利了波拿巴分子准备政变。伴随着立法会议的解散和独裁政权之集中于波拿巴上层分子手中而来的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的国家政变。这个政变实际上扼杀了第二共和国并于一八五二年终在法国恢复了以军事警察的“第二帝国”为形式的君主制。

与一七八九——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向下坡路发展。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这种向下发展的形势反映

了階級力量配備方面的主要特點。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要動力，但是它們明確的階級意識還沒有充分成熟。缺少能夠團結和領導它們的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因此，革命中的領導權不屬於它們，而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中的“路易·勃朗分子”的背叛政策給予資產階級以莫大的幫助，他們使無產階級信任資產階級并鼓吹民主共和國中的階級合作。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和背叛行為以及農民的不信任無產階級，使共和派資產階級有可能團結一切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并且击潰無產階級而建立起自己的專政。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反革命政策決定了政權的轉移到保皇派分子手中，而“秩序黨”的反革命政策及其在內部互相敵視的各集團之間的內哄，則導致了正統派分子和奧爾良分子的失敗，从而使波拿巴主義獲得了勝利。

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历史教訓曾被各國的革命家們所認真研究，但是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才根據它們做出了正確的結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經驗，作出了一系列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方面以及革命工人運動的戰略和策略問題方面的重要結論。關於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教訓，馬克思寫了兩本專門著作：“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和“路易·波拿巴政變記”。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在對待資產階級國家方面的任務的結論，是最重要的結論之一。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經驗令人信服地指出：君主專制的國家機器和它對人民施行暴力的機關（軍隊、警察、官僚機構）仍舊在資產階級共和國內保存着，甚至更加完善了，它們依然是與人民為敵的東西。因此，第二共和國的經驗使得工人階級提出新的極重要的關於對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任務：不是改善它，而是摧毀它。列寧寫道：“這個結論乃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點”。（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

版，第二九頁）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証明：“为爭取自由的斗争，只有由無产階級来領導它，才能进行得徹底”。（列宁：“关于杜馬党团活动报告的發言”，載“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一二卷，第四〇三頁）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最重要的教訓在于必需使农民摆脱資產階級的影响，并把他們爭取到工人階級方面来。一八四八年法国無产階級沒有能把充当資產階級后备軍的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是無产階級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馬克思在強調無产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必須与农民結成联盟并且領導农民群众的同时，也把这个結論适用到無产階級革命中，他說，無产階級只有在那种情形之下能够成功，即必須“得到一种合唱，若沒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鴻哀鳴的”。（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卷，第三一七頁編者注）

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历史經驗显著地証實了革命無产階級社会主义原理的正确性，指出了鼓吹階級和平与階級合作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会主义理論对無产階級的一切不正确性和危害性。

列宁写道：“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对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鬧叫囂，五花八門的社会主义派別，給了一个致命的打击……。共和派資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事变时槍杀工人，最終地証明了只有無产階級具有社会主义本性，……一切关于非階級社会主义和非階級政治的学說，都証明是些無謂的胡說”。（列宁：“馬克思学說底历史命运”，載“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七〇——七一頁）

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与当时許多欧洲国家中的資產階級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对欧洲革命事件的發展，特别是对德意志联邦和意大利起了巨大的影响。

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期間階級斗争的丰富教訓，对現今資本主义国家內的工人运动仍旧有着巨大的意义。

参 考 書 目

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斗争”，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一九五二年。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載同上書。

馬克思：“法蘭西內战”，載同上書。

“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一八卷（“回忆赫尔岑”）；第二四卷（“路易·波拿巴”）；第二五卷（“卡芬雅克分子‘現在’和‘將來’是从什么階級来源来的？”，“国家与革命”）。

包杰金、莫洛克合編：“一八四八——四九年的革命”，第一——二卷，一九五二年（請參閱書評）。

篇名 Революция 1848 во Франции

著者 查斯琴克尔 (Н. Е. Застенкер)

譯者 江平

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三六卷

一八四八——四九年的奧地利革命

一八四八——四九年奧地利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其基本任務是消滅奧地利本部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其他部分的封建專制關係，粉碎多民族的奧地利帝國，解放被它壓迫的各族人民，並建立一系列獨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奧地利革命是直接和這一時期的德國革命事件相聯系的。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中，無論在奧地利或在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前提已經成熟了。奧地利帝國是“各族人民的監獄”，國內的封建壓迫密切地和民族壓迫交織在一起。當時保持的封建關係劇烈地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到處處於依靠地主的農奴地位，在非奧地利區域中遭到封建的以及民族的壓迫。資產階級對於政府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也感到不滿。差不多在一切的社会階層都弥漫着不滿的情緒，在國內增長了政治危機，由於一八四七年在歐洲各國（包括奧地利在內）爆發經濟危機的結果，這個政治危機更加尖銳化了。

法國的二月革命成為奧地利革命發動的直接推動力。在德國西南部的革命事件更加速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爆發。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三日在維也納開始了人民起義，就在那一天使梅特涅首相辭職。三月十五日皇帝斐迪南一世被迫答應頒布憲法。三月十七日成立了主要有貴族代表和自由派的官僚參加的政府。資產階級的武裝力量——國民近衛軍成立了。組織了武裝的學生組織——學院軍團。一八四八年四月，由資產階級的

代表成立了公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和政府并行的，在某一个时期起了资产阶级政权的非正式机关的作用。

在维也纳以及奥地利本部的其他城市发生事件的同时，在多民族帝国的个别部分开始了革命。三月十五日在匈牙利首都——佩斯爆发了起义，斐迪南一世被革命运动的规模所吓倒，被迫同意组织对国会负责的匈牙利政府，并批准匈牙利国会所通过的宪法。革命运动在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外喀尔巴阡展开。三月十八日在米兰发生了民族解放起义，差不多把整个伦巴底——威尼斯地区的奥地利军队驱逐出去了。革命运动也蔓延到捷克、加里西亚和奥地利帝国的其他部分。无论是在奥地利本部，或在非奥地利属的居民区，各城市中的发动到处都得到农民起义的支持。农民拒绝交纳封建的赋税。

广大的人民群众——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是一八四八——四九年的奥地利革命的推动力。在这些起义和革命发动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但在奥地利革命中，也和在德国革命中一样，资产阶级是领导者。工人阶级的人数还太少，过于薄弱，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利用它既经获得的政权来巩固争取到的成果，而在对共同的敌人——专制制度——刚刚获得胜利时，就开始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

一八四八年四月政府颁布反民主的宪法，这种宪法规定两院制，国王有绝对否决权，财产资格和剥夺工人的选举权。四月的宪法引起奥地利居民最广泛阶层的愤慨，这种愤慨由于政府一再企图剥夺人民的民主果实而越发加强了。五月十五日在维也纳发生了武装的人民发动，来回答政府解散国民近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在这些发动中工人和学生起了主要的作用。内阁被迫取消了关于解散国民近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并且发

布了关于选举制度民主化的命令。五月十七日皇帝斐迪南一世和他的亲近人员逃到反革命阴谋中心的主要城市梯洛爾-英士布魯克。温和的资产阶级代表們，力圖和宮廷妥協，坚决主張国民近衛軍中央委员会自动解散。之后，政府于五月二十六日頒布解散学院軍团的命令，这件事情在当天就引起了学生和工人的新的起义，以人民群众的胜利而結束。政府不得不停止解散学院軍团并作了一系列其他的讓步。

在奥地利帝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事件是在一八四八年六月發生的布拉格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工人，手工業者和学生。这次起义得到捷克其他城市人民的發动以及农民的發动的支持。布拉格起义被温狄什格萊茲元帅的奥地利軍隊殘酷地鎮压下去。

巴黎六月起义的失敗，促使封建專制的反动地位在奥地利帝国加强，和害怕無产阶级独自进军（如在巴黎發生过的）的奥地利的自由资产阶级直接轉到反革命陣营中去。

六月二十二日奥地利帝国會議在維也納開幕，参加會議的大多数是屬於资产阶级的温和自由派的代表。會議拒絕滿足农民关于無代价廢止封建賦稅的要求。一八四八年九月，會議通过以贖金的办法来廢止封建賦稅的決議。贖金的数目規定为农民每年所交賦稅的二十倍。不徹底的解决土地問題的決議，引致农民后来脫离革命。

八月十二日皇帝及其宮廷人員返回維也納。自此以后，反革命的力量轉为攻势。八月十九日政府發布命令，減低从事公共工程的工人工資。八月二十三日維也納工人以起义来回答，起义被资产阶级的国民近衛軍所鎮压。八月二十三日的事件，証明脫离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專制的反动派之間結成了联盟。

奥地利的自由资产阶级坚决出来反对賦与哈布斯堡帝国各

族人民以自決權。他們慶祝在庫斯托次附近意大利人民的失敗（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一八四八年八月奧國軍隊的占領倫巴底。奧地利的反動派在意大利北部獲得了軍事上的勝利，就開始準備向匈牙利進軍。為了對匈牙利實現反革命計劃，奧地利的保皇奸黨就利用了匈牙利政府對受匈牙利統治階級壓迫的斯拉夫各族人民民族解放要求的敵對態度。在匈牙利統治下的斯拉夫人民運動的領導權落到反動的地主手中。保皇奸黨和克羅地亞貴族階級勾結，組織了對匈牙利革命的武裝干涉。九月十一日克羅地亞叶拉契奇總督的軍隊侵入了匈牙利，但於九月二十九日他們被匈牙利的國民軍所击潰。十月五日奧地利陸軍部長發令，派遣維也納部隊援助叶拉契奇來鎮壓匈牙利革命。維也納人民群眾對於實現這個反革命計劃的反抗，表現在十月六日這天的人民起義。十月七日皇帝斐迪南一世從京城逃往反革命勢力中心的奧里穆茨城。維也納的十月起義是奧地利革命的頂點。由於十月革命的結果，維也納的政權就在幾個星期內落到依靠武裝工人和學生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手中。新聞記者兼劇作家梅森哈威爾領導了維也納的防禦戰，他在这方面沒有豐富的知識和能力。在組織維也納防禦上起了巨大作用的是波蘭革命家貝姆。在維也納指導左派的法蘭克福議會的羅伯特·布魯姆積極參加了奧地利首都的保衛戰。但在十月底起義者的抵抗被摧毀了。一八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溫狄什格萊茲的軍隊占領了維也納，對起義者施行了殘酷的懲罰。維也納十月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的叛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領導起義的軟弱、不徹底和猶豫不決，以及缺乏統一的集中領導也促使維也納起義失敗。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維也納起義具有極大的意義。他們所主持的“新萊因報”，在維也納起義的日子里，發表宣言號召援助

維也納革命。馬克思在指出維也納起义的重大国际意义时说，維也納革命对于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影响，打乱了反革命的全部作战计划。

紧跟着在奥地利的維也納起义失败之后，反动封建王朝的代表及以施瓦爾曾堡公爵为首的大资产阶级代表组成了新的内閣。一八四八年十月二日，斐迪南一世退位之后，弗蘭茨·約瑟即位，他在一八四九年三月实行反动的宪法，并解散了国会。奥地利的反动派对于統一日耳曼的计划公开地采取敌对的态度。一八四九年四月奥地利政府否决了全日耳曼法蘭克福国民会议所制定的帝国宪法，并从法蘭克福召回奥地利代表。在奥地利本部的革命失败之后，于一八四九年夏，奥地利政府借沙皇俄国军队的援助，接着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

一八四八——四九年奥地利革命具有未完成、不彻底的性質。一八四八——四九年在奥地利帝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叛变并轉到反革命陣营中去。由于在奥地利帝国革命失败的結果，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任务没有得到解决，專制政体恢复了。但由于革命的結果，封建王朝的基础發生了动摇，要想完全回到革命前的状况成为不可能了。农民以贖金的方式——虽然对他们來說是很痛苦的方式——摆脱封建的赋税，促成了国家資本主义的發展。

参 考 書 目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七卷（“一八四八——四九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一——二章），莫斯科—列宁格勒，一九三〇年。

馬克思、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載“馬克思选集”兩卷集，第二卷，列宁格勒，一九四〇年。